

《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》及其真伪

徐宝余

清顾施祜《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》一般著录为十九卷或三十九卷。对于这样两个版本的真伪问题，目前一直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因为一方面，文选学家对于顾本存在着成见，如骆鸿凯即认为此类是“沿明人积习以著书”，“其书皆庸陋无足称”，^①一方面由于三十九卷本的躐入，使人们对于顾本的真实面貌失去了评定，从而认定三十九卷本即为顾本。本文从诸本的比较中得出所谓顾本三十九卷乃是伪本的结论，这对于重新认识顾本的价值，重新评估康熙年间的文选学研究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顾施祜，字适园，吴江（今江苏省苏州市南）人。生平不详。据《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》著有《文选疏解》十九卷、《盛朝诗选初集》十二卷、《杜工部诗疏解》二卷。^②而据现有藏本，它还有一个所谓三十九卷的本子，即嘉庆二十四年的刊本。其真伪详见后文。

是书十九卷本，扉页左半页中间有“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”竖写两行蓝黑大字，天头有“富沙郑山公先生鉴定”，右下角有“本衙藏板，翻刻必究”朱印，左上角有“下部诗文嗣出”朱字。左下角有“心耕堂”字样。接下来是郑重《文选汇注疏解序》，文后有“郑重之印”、“山公”二方印；顾施祜《凡例》，文后有“顾施祜印”、“适园”二方印；昭明《文选序》；李善《上文

选注表》；吕延祚《进五臣集注文选表》；目录；正文。全书只为《文选》赋体部分。关于为什么此书只付梓赋体部分，这在郑重的《序》中有着明确的说明：“犹恐或有遗义，复与二、三友人取诸书重加参订，复者去之，芜者删之，缺者补之，音之未当者正之，研敷尽善，名曰文选六臣汇注疏解，仍六十卷。将欲尽付梨枣，而全帙颇多，因念是书赋为首类，又居十之三，如《三都》、《两京》、《长杨》、《羽猎》，宫殿江海，卉木禽鱼，缘情体物，典章制度，实繁且夥，适园钩索精微，解义明晰，尤为学者最切要，不可不亟览者，因先举以属梓，其它诗骚、杂文，方图嗣举，以成合璧。”郑《序》作于康熙丙寅年，即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。则是书最早当成于是年后不久。

据顾施祜《凡例》可知其书大要。一是“以李善、五臣为经，而诸家纬之。语则取长补短，事则择精而芟芜。间补注一二，皆原本载籍，非敢谬增臆见也”。细绎全书，所云据实。字句考释，洵非所长。而于所注，又往往取资李善、五臣等诸家之语简省为之，皆能做到文省而意明，于初学者尤为裨益。而据书中正文所标异文常有“善某作某”字样，及与善本、六臣本作比勘，则正文文字大体从五臣，由此可知其所用底本为五臣本。二是“逐段疏解”、“于大段落之首加一提纲，又间于小段落之后添一细目”，既能起到疏通文意、章句了然之功效，又便于读者条理思想，不致陷入辞阵，而茫然不知所云。故其断句，弗依六臣，而据行文蕴意，每一单句，各自为释。郭步青重镌此书时，于《叙》中称赞云：“句梳节比，分章跋尾，匠心独运，大有益于初学。”三是“引证群书必注书名，间有不注者，以人所习知故也。更有引古宜存者，书之上阑，以备考证”，综考全书，未为全是。所谓“书之上阑”盖稿本如此，刻本已无此例。至于将“善曰”“向曰”等各家注释字样一并省去，则未为尽当。四是此书成于众人之手，非一人功也。郑重《序》云：“复与二、三友人取诸书重加参订。”顾

施祜《凡例》亦说：“是书成吾郑夫子研精殚思，裁正独多，而暗公倪先生与俞邵黄先生俱熟精选理，复为订定。若夫讨论典故，研核意义，使一篇之中段落分明，疏解条畅，则有同学金德藩、徐尔瀚、徐翔念、郑宣成诸子。”然观是书每卷前及《李善上文选注表》后所载参订之人，除顾所举金维宁（德藩）、徐世沐（尔瀚）、徐介（翔念）、郑霖（宣成）诸子，尚有卢熙（子纯）、储振（玉衣）、张廷枢（景峰）、高尔公（嵩侣）、郑默（静公）、吴曹植（以巽）、陈炅（颖永）、徐时浚（仲宣）、唐勋（万有）、赵震东（青雷）、朱彧（公旭）、顾万春、顾卓、张远、徐泓、李维均、束齐等，所载鉴定之人除顾所举郑重（山公）、倪灿（暗公）、黄虞稷（俞邵）外，还有李天馥（容斋）、顾有孝（茂化）、董闾（方南）诸人。前后参与者达二十八人之多。

是书在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又有郭步青的重镌本。据其《叙》称：“课诗赋取材之邓林，若欲取材莫过于《选》也。然而《选》之难读莫过于赋，《三都》《两京》之作，巨丽玮瑰，怵心骇目，学者未终篇而往往欲韬其帙而阁置之。林西仲尝言今人不能效古人之作，由于不能效古人之读。洋洋大制，沛若河汉，初学者不得其津筏，不免自崖而返。此名家之选所以贵于擅场也。愚末学荒芜，抱惭舛鄙，自请业于族兄之屏先生之门，授以顾适园先生《文选疏解》。……虽适园先生或有全本注疏，抑或另有注疏善本板行于世，愚足迹未广，耳目未周，未尝购读。惟据所得者，倾囊开雕，竭精校讎，另易生面，以听诸君子之取材耳。”可见其重镌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阅读和取材。由于郭本现已很难见到，所以所谓的“另易生面”，是一个什么样子，现在已不能窥知了。不过他的这篇《叙》被保存在嘉庆本中，所以还是能够得其一二：首先它与乾隆本有所不同是肯定的，其次它也不是足本，只是据顾本而刻，故也只有十九卷，第三是它的校讎还是比较认真的。

嘉庆本为三十九卷，扉页左半页中间有“昭明文选汇注集解”字样，天头亦有“富沙郑山公先生鉴定”数字，题为“六经堂藏板”、“嘉庆二十四年新镌”，前有郭步青的《叙》及倪灿的《序》。只是前十九卷与后二十卷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。

首先是版式有别。前十九卷页皆有格线，而后二十卷除卷前半页间有格线外，皆无。此一别也。正文前十九卷除有一页为左右双栏、上下单栏外，其余上下左右皆为双栏；而后二十卷皆为单栏。又，目录部分，前皆为双栏；自第二十卷所在页始为左右双栏、上下单栏，除自第二十二卷始有四页皆为单栏外。此二别也。全书一般是半叶八行，行二十二字，至卷二十七始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四字。此三别也。前十九卷没有剜补痕迹，而后二十卷剜刻所留墨钉较多，且剜除部分并没有补上。此四别也。

其次是注释体例有别。前十九卷大体遵从顾施祜《凡例》，此前文已有发明。而后二十卷，并非“逐段疏解”，且于篇末多未疏解。此一别也。又，即使有疏解，并不遵从前十九卷之例冠以“疏解”二字，而是直接引用他人评语，或加一“按”字。此二别也。又，《凡例》言“以李善、五臣为经，而诸家纬之”，然不出当时人语，而后二十卷注文多引何焯校语，篇后所评则多出于何焯、方伯海、孙月峰、邵子湘，间采沈归愚、陈漱泉、孙端人、李榕村、陈螺渚、孙执升等人评论；前十九卷所用底本为五臣本，参善本作校记，如《两都赋序》“抑国家之遗美”下有“五字宜照善本删去”数字，而查六臣本于“抑”字下有“五臣有‘国家之遗美’五字”字样。又，《西都赋》“疆场绮纷”，六臣本“纷”作“分”，并于此字下小注“五臣作纷”。可见其所用的底本当为五臣本。然亦有正文不依五臣的，如《西京赋》“化俗之本”，六臣本“化俗”下小注“五臣本作俗化”，则此处所依的是善本。当然这样的例子仅一见。后二十卷所用底本为李善本，参六臣本作校记。因其注中常有“五臣作某某”“六臣作某某”校勘字样。如刘越石

《答卢谌》一首“天下之宝常（笔者按：此“常”字六臣、李善本皆作“当”）于天下共之”下有“六臣作与”、魏文帝《乐府二首·善哉行》“随波回转”下有“六臣‘回转’作‘转薄’”校语，善本亦分别作“回转”、“于”，则此处从善本。此三别也。

第三，篇第次序有别。后二十卷与今所见《文选》通行次序相左。如卷二十四《美女篇》下云：“六臣本《名都篇》在《美女篇》前，因何曰：‘托美女以见贤本遇合有时，当知自重，而求贤者亦不可不知贤人自守之义。’”又，同卷《长安有侠邪行》下云：“六臣《日出东南隅》在《长安有侠邪》前。”又，同卷《悲哉行》下云：“六臣《吴趋行》、《塘土行》在《悲哉行》前。”

第四，点读有别。后二十卷始有圈点及点读墨迹，而前此皆无。

第五，属名有别。前十九卷所属鉴定、参定之人每卷并无全同者，盖分工相错也。然后二十卷并题为郑重鉴定，徐介、金维宁、郑霖参订。

则后二十卷既非顾施祯所为，又非郭步青所补明矣。

若用乾隆本以及通行的六十卷本与嘉庆本相比较，可以发现又有所不同。就其分卷来说，乾隆本赋为十九卷，与通行的六十卷本次第相同。而嘉庆本既是全本，为何分为三十九卷，而不是六十卷？也就是其他文体的份量为何不足？二是内容上，嘉庆本多出三篇，即诸葛亮《后出师表》、陶渊明《闲情赋》、王羲之《兰亭记》，如果我们将此与前所举嘉庆本评注所引诸人联系起来看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即：嘉庆本后二十卷是杂采方廷珪的《文选集成》、陈云程《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》、于光华的《文选集评》等书补缀而成的，大概为书贾所为，所以刊印质量比较差。尤其需要说明的是，嘉庆本后二十卷取资方廷珪的《文选集成》尤多。一是文后所附三篇乃与方本一致；二是其圈点之例又与方本一致；三是其分卷受方本影响。方书《凡例》云：“是编

旧分为六十卷，今约为五十九卷，经前人所訾其未收入者，代为补出《后出师表》一篇、《兰亭记》一篇、《闲情赋》一篇，共三篇，另成一卷，仍为六十卷。”又云：“圈点悉依林西仲古文析义，眼目用黑圈，佳处用密圈，结穴用重圈，余用句点句圈，段落用截，大段小段即于截下分注。”这与嘉庆本后二十卷若合符契。据书前有郭步青的《叙》可以得知，嘉庆本前一部分所用底本当是乾隆本。但是由于书贾为了求全，又用了《集成》等别的本子来补，所以在卷数上才会闹出这一不伦不类的样子，赋占了十九卷，而其余被压缩成二十卷，本来与最后所附三篇共同构成四十卷，不知为何又没有以四十卷行，仍题为三十九卷。

嘉庆本既然前一部分是以乾隆本作为底本，不知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乾隆本的真貌。嘉庆本为三十二开小开本，而康熙本为十六开大开本；嘉庆本为单黑鱼尾，版心有“耕心堂”字样，而康熙本无鱼尾，版心却是“心耕堂”字样；嘉庆本前十九卷的注文没有句读，而康熙本注文有句读；康熙本于每一“疏解”二字上加一框线，而嘉庆本没有；嘉庆本于凡例后列有“同阅姓氏”六十二人，如翁叔元、赵之鼎、李光地、仇兆鳌、林云铭、李景云等人参与其间，康熙本无。除了这五点明显的不同外，嘉庆本与康熙本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行文方式上都是一致的。这说明很可能就是乾隆本原有的版式。只是是作“耕心堂”还是作“心耕堂”，还是两者都对，让人费解。《贩书偶记续编》卷十三“《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》二卷，清吴江顾施祯辑，康熙二十五年心耕堂刊”，^③说明确有一个“心耕堂”在，则嘉庆本作“耕心堂”未知是雠校不精而造成的讹误，还是有意错人耳目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关于此书前十九卷作者，亦当辨明。嘉庆本倪灿《序》曰：“故文选之学一淆于五臣，再晦于后代诸儒之纂辑，剽义窜辞，支离覆逆，交趾旁午。注愈繁而意愈晦，此建安郑先生汇注疏解之所由作也。先生之为是书也，经始于顾子适园，复与二三同志详

加删定，每一篇成，手自勘讎，朱黄钩贯，上自年经月纬，下至音义章句。悉通以训故，荟萃诸家，穿窒碍，定纰缪，丝分缕晰，期于一见朗然而止。……先生此篇取诸家注择其善者为之，剟其瑕砾，擷其萧稂，阅一载而后成书，岂徒赋为末学之津梁，抑且补江都之未备。”此序作于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，明言是书为郑重所为，且并未提黄虞稷、李天馥、顾有孝、董閤所作鉴定一事，即使自己参与此书亦只字未提。又，诸本皆题顾施祜纂辑，而只云郑重鉴定，且康熙本并无倪《序》，则是《序》真伪很值得怀疑。

最后关于此书的评价。郑重《序》有评：“嗟乎！选学之废自唐迄今已将千年，有适园是书出，旧学复行，于是以羽翼经史、鼓吹百家，其为裨益，良非浅鲜。况今圣皇御宇，崇文重道，渊云司马之才，方有待于后起，俾人得是书而研究之，将见家握灵蛇、人吐白凤，以佐我圣代休明之治，即上跻姬刘之盛，复覩彬彬之风，不难矣。岂徒配青俪白、繁丽秾蔚之流所可语哉！”誉之甚高。由于其全书未能全部付梓，若就赋体部分来说，它的确能够给以简明易了的感觉，对于一个想阅读《文选》而又不致中途而废的今人来说，它的确称得上是本好的入门书。尽管它的学术参考价值不大，但是把它说成“庸陋无足称”恐怕也未为尽当。

注：

① 骆鸿凯：《文选学·源流第三》，页116，中华书局1987年11月。

② 《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》，武作成补，中华书局1982年4月。又，《贩书偶记续编》卷十三有“《杜工部七言律诗疏解》二卷，清吴江顾施祜辑，康熙二十五年心耕堂刊”，当即前所言《杜工部诗疏解》一书之异名。

③ 孙殿起：《贩书偶记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九级古代文学博士生